

汪东林◎著

远去的背影

政协人物记



当代中国出版社

远去的背影

政协人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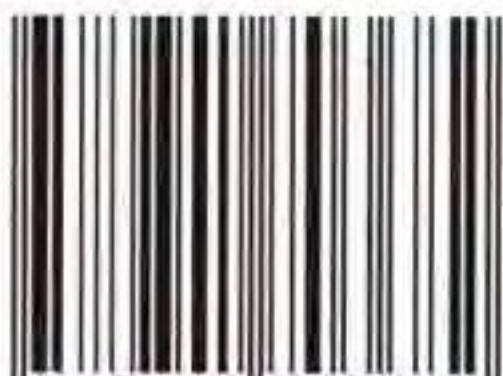
文格晶莹气亦清，

渊渊掷地作金声。

不须刻意媚时俗，

自出新裁论古今。

ISBN 7-80170-368-5



9 787801 703682 >

出版人：周五一

策划编辑：罗少强

责任编辑：陈立旭

封面设计：黄俊雄

书号：ISBN 7-80170-368-5 / K · 73

定价：20.00元

汪东林◎著

远去的背影

政协人物记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背影. 政协人物记/汪东林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2

ISBN 7-80170-368-5

I. 远... II. 汪... II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8412 号

责任编辑 陈立旭
策划编辑 罗少强
装帧设计 黄俊雄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 行 部 (010) 66572157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印张 1 插页 18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序

自 1988 年拙作《梁漱溟问答录》出版之后,我继续挖掘有关梁漱溟先生新的史料,十多年来,撰写了若干文章。四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全国政协工作,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近几年来,又撰写了有关赵朴初、十世班禅、程思远、章乃器、宋希濂、黄维等一批我所结识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中短篇传记作品。前不久,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登门约稿,要我把从 80 年代以来发表的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中短篇名人传记精选结集出版,题为《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我以此再次与广大读者结缘。

是为序。

汪东林

2004 年 6 月于北京文溪斋

目录

001 漫忆赵朴初

事先谁也料不到，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在座谈会上重重放了一炮。赵朴初并没有在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发言。/ 1974年“批林批孔”，唯梁漱溟迟迟不讲话。最后竟讲了两天，八个小时。赵朴初还为梁漱溟写条子，补充毛主席语录的出处。/ 1976年追查天安门诗抄时，赵朴初郑重地说：我可以坦率地讲，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

023 听十世班禅谈往事

我60年代初写的《七万言书》连累了李维汉。他被免去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之职。/ 1966年初，红卫兵把我五花大绑，强行揪斗，进行残酷地肉体和精神折磨。/ 周总理把我转移到北京军区一个兵营。官兵们管我叫“首长”。/ 1968年以后“文革”斗争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时期。我天天读《新华字典》，学会了汉语。

033 于树德先生

大事不糊涂的于树德，从来不轻易随从别人，连毛主席他都敢在大庭广众前顶撞。/ 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认为，林彪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不甚妥当……国家主席不可不设”。/ 于树德说：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 1922年于树德见过列宁之后，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有张国焘这样的人，就不想加入。

051 忆柯灵同志

柯灵听到“文革”中红卫兵烧梁漱溟书时，连连说：这是专革文化的命。/说起《不夜城》这部电影时，柯灵说，这是“遵命文学”，是完成李维汉交办的任务。/柯灵说，李维汉对建毛主席纪念堂有看法。批评毛主席的塑像设计得不好。/柯灵赞同巴金倡导筹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搞不起来，人们血的记忆却是不会忘却的。

065 梁漱溟其人其事

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进言执政党要注意农民问题，不应该工人生活在“九天”，而农民却生活在“九地”。/梁漱溟直指毛泽东，责问“领导党常告诉我们的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你本人有没有听取不同意见，承认误会了别人的雅量”。/毛泽东则说，梁漱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个“反面教员”。/1974年因反对“批林批孔”遭大会批判，梁漱溟语惊四座：“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前夕，梁漱溟直言批评毛泽东“文革”的搞法，“自然是人治……党章不顶用了，宪法也同样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

085 1958年，梁漱溟向党交心

在向党交心运动中，梁漱溟不愿为换取“红心”而必须承认自己有“黑心”。/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与李达、陈独秀相熟。他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的“汉子”。/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毛泽东说梁漱溟太着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

梁漱溟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既年轻又有才干。毛泽东竟笑出声来说，梁先生看人还蛮准呢。

109 梁漱溟与冯友兰

冯友兰比梁漱溟小两岁。在“五四”时期，冯友兰是梁漱溟的学生。/ 1974年冯友兰“批林批孔”，梁漱溟责叱其谄媚江青，断其关系。/ 1985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省批孔是“哗众取宠”，梁漱溟才心气平和了些。

115 “文革”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

梁漱溟被抄家的同一天，红卫兵闯进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打扫全部厕所。/ 一个红卫兵用手摸了摸唐生明的大肚皮：“瞧你大腹便便，里边吸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就算你是起义的，能还得清欠下人民的债吗？”。/ 章伯钧被红卫兵押到政协，从车上爬了出来又爬了进去。

141 在全国政协“五七”干校的岁月

1357信箱，原意是人大、政协等13个单位的“五七”干校。/ 民革中央《团结报》编辑部副主任梅电奎在码头上走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 四位部长级的干部组成轰麻雀战斗队，不停地使劲鸣锣，摇晃着长竹竿，还大声呼唤轰赶麻雀。

161 1976年记事

史良的丈夫陆殿栋精通法律和英语，是政协委员。数次批判梁漱溟的大会中，他总是最后一

个表态者。梁漱溟提到陆殿栋时，脱口而出：“陆先生是位正直的学者。” / 王芸生是老报人，他学识丰富，手勤脑勤，记忆力好。凡各种传达或向上汇报，于树德一概推在王老的身上。 / 于树德比王芸生大8岁，组员心目中的于树德要比王芸生高出一截。 / 杨东莼是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某位写文章的秀才“创造发明”的，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

171

全国政协文化组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

1978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闭幕，停顿十余年的人民政协工作全面恢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任之首次提出为吴晗平反，为“三家村”平反。 / 周扬紧紧握着丁玲的手，半天才说了一句：“我对不住您！”丁玲立即答复：“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难不比我轻啊！” / 《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发言，一开始就吸引着全体与会者。 / 乌兰夫是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更高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能给他下指令的，是什么高位的领导，就可想而知了。 / 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厉声厉色地训斥余焕春：“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要彻底翻不是反毛主席么？”

189

章乃器侧影

章乃器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他提出：再看我五年吧，五年不够，还可以看十年。 / 章乃器在“文革”中以绝食抗议红卫兵对他的“专政”。 / 经陈云批示，中央有关部门为章乃器摘掉了“右派”帽子。

203 宋希濂与瞿秋白

1935年，瞿秋白面对“审讯”他的宋希濂痛斥国民党。/ 瞿秋白牺牲前泰然处之，他吟读《全唐诗》，高唱《国际歌》。/ 几十年后，宋希濂证明瞿秋白没有叛变。

229 宋希濂重结良缘

解放军渡江，宋希濂率部从武汉向西败退，至宜昌爱妻冷兰琴暴病而亡。/ 1961年3月1日，宋希濂等7人身着整洁的服装，带着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进了全国政协机关大院，开始了新生活的第一天。/ 好一阵热烈的掌声，把婚礼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宋希濂易吟先都未曾料到，他们重结良缘会如此温暖亲切。

247 固执的黄维

黄维被俘后不反省自己，却研究起了“永动机”。/ 黄维被特赦后，学习时一言不发，回家后继续研究“永动机”。/ 1976年“批邓”，黄维被迫登台发言，事后深感内疚。/ 1979年黄维随团到上海视察。/ 黄维为了让台湾老乡看到家乡面貌甘当“演员”。

271 程思远的沉默和困惑

程思远对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非常困惑。/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程思远放了一“炮”。/ 程思远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也难免上当受骗，这个教训沉痛而深刻啊！

漫忆赵朴初

YUANQU DE BEIYING

事先谁也料不到，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在座谈会上重重放了一炮。赵朴初并没有在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发言。/ 1974年“批林批孔”，唯梁漱溟迟迟不讲话。最后竟讲了两天，八个小时。赵朴初还为梁漱溟写条子，补充毛主席语录的出处。/ 1976年追查天安门诗抄时，赵朴初郑重地说：我可以坦率地讲，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

*

尽管自己是个晚辈，却有幸被赵朴老称为“忘年之交”，而事实上彼此也的确有着相识相交四十年的经历。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在眼前一幕幕掠过……

初识赵朴初

6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一次喜饶嘉措大师作震惊举座发言的宗教组座谈会上。那时正值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后，全党全国都在调整政策，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民主气氛颇浓。全国政协各工作组也频频召开座谈会，不但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且还增加了发言“百无禁忌”（李维汉语——笔者注）的指示，因此工作组的座谈会出席率高，发言踊跃，有些意见颇为尖锐，最有名的是仍戴着“右派”帽子但还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章乃器先生。他曾多次发言，这使他招来“右派”翻案、继续进攻的“罪名”，于1963年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是后话。相比之下，各工作

组之间，就数宗教组座谈会开得最少、时间最晚，意见也比较平和。事先谁也料不到，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最后在座谈会上重重放了一炮。



漫忆赵朴初

◆ 80年代初，本书作者与赵朴初先生（左）在一起。

这次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巨赞（佛教法师）、陈撄宁（道教协会会长）、皮漱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等人。赵朴初居士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因此当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的神态。由于不通

汉语，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五百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军队败送，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做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实行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

能批评自己……

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管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作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有些稀奇古怪的说法，我就不能赞同。什么“好心办坏事”、“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等等。照我的看法，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不管是谁干的，好与坏，善与恶，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也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也成了好事；或者因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不批评。更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

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两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向中午12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发表后，以他的诗朗诵般的语言缓慢而响亮地说：

“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 1992年10月，本书作者与赵朴初先生（右）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

赵朴老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初识赵朴初先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一些“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

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分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掂量掂量，下次再发表高见”，等等。当时我虽然刚离开大学校门，但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脑子里还紧紧地绷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喜饶嘉措的言论，心里是认为很“右”，要在大学里发表恐怕是要受批判的，因此颇惊讶赵朴初对此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在交代了几句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写份简报之后，便问我家乡在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我回答是“浙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一口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依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笔者注）；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要将小组会的记录整理好，对对笔记，力求全面、准确，然后先送他过目，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他前后两次交代此事都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构设置，是九个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笔者注），但只有一个办公室，因此一个工作秘书常常交叉具体分管两个或几个工作组的秘书（含记录、简报、会务）工作。我是刚到任的大学毕业生的角色，正充当实习生的角色，只要忙得过来，几乎有会必去。这次宗教组座谈